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

本文人类学

[爱尔兰]泰特罗讲演

王宇根 等译 吴剑平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文人类学/(爱尔兰)泰特罗讲演;王宇根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

ISBN 7-301-02772-9

I. 本… II. ①泰… ②王… III. 比较文学—研究 IV. I0—

03

书 名:本文人类学

责 任 者:泰特罗讲演 王宇根等译

责 任 编 辑:张文定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2772-9/I.0360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2502015 2559712 2502032

印 刷 者: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插页 0.325 印张 12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8.50 元

序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学问,文化人类学则通常是指研究人类习俗的一个较狭窄的领域,也就是对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在时间和地域上都距离西方发达世界十分遥远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人类自出现以来,大都生活在互相隔绝的小社会中,每个小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观,思维方式,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制度。这些差别使人类分化成不同的民族,成为痛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文化人类学者以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生活方式,跨越时空的界限来研究极端成对比和极端相似的现象,以认识人类文化的普同性和独特性。因此,人类学也就是把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作一面镜子来研究自己和他人以求相互理解的一门学问。

文化人类学多半依靠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来实现。新兴的,也就是泰特罗教授所研究的“本文人类学”则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等来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泰特罗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他最近出版的新著《压抑与赋形》以极其丰富的材料说明了文学艺术是如何体现着社会潜意识的。他在北大的系统讲演使学生大开眼界,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领域。

泰特罗教授是爱尔兰人,他从 1965 年起一直在香港大学任教,1982—1990 年曾担任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会长。他对亚洲文化与艺术深有研究。90 年代他在香港大学创办的比较文学系可以说在文学研究界掀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仅今年夏天入学的本科生就有 165 名,研究生 60 余名,这无论对哪一个文学系来说都是空前的。我想这一盛况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泰特罗教授有意识地将文化人类学引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新兴领域的结果。

我们深自庆幸泰特罗教授能三次访问北大,为我所研究生进行了系统讲授。通过多次接触,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已结成亲密的友谊,并已商定合办面向世界的英语比较文学学术刊物,进一步交换学者,共同举办会议等等。我们深信这样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乐黛云

1994.9

前 言

这五讲各自独立,但又为我所称为“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的阅读程序统一起来。它们集中讨论东西比较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讲,“建构他者:哥伦布与高更”,试图以对哥伦布的叙事本文和高更的绘画本文的阅读实例揭示出潜藏在这些本文下面的文化无意识,因为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质询,本文必然会显示出它表面上试图掩盖的东西。

第二讲,“学科解构”,涉及的是我们的阅读实践,知识整合,以及它们如何受意识形态前提控制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跨文化再读的问题,这些再读表面上是对主导范式的一种抵抗,但实际上却经常以另一种形式重复了这些范式。

第三讲,“比较诗学的有关问题”,讨论的是近期对作为一种潜在阅读策略的跨文化诗学的有关研究,并对与哲学实在论有关的“模仿论”的意义并因而对建构西方文化的某些成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四讲,“表演人类学与诠释”,试图揭示潜藏在作为本文的表演下面的某些前提假设。戏剧生动地显示出,所有的再现和诠释都是一种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视本文为一种“话语”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实践活动所具有的

社会和文化机制。我举了一些对东亚和西方的再现诠释实践进行解读的实例。

第五讲,“昆剧《麦克白》”,讨论了在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中国戏曲形式时所引起的一些实践和理论的诠释问题。我以传统和当代莎评为背景细究了《麦克白》的这一中国样式,并认为这一表演想象性地和现代西方读解联系在一起,从而丰富了那种自我质询的诠释人类学。后者抛弃了那些通常形成影响研究的确定假设,因此必然适于这些再现和诠释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

第一讲

建构他者：哥伦布与高更

(一)

讲坛设在一个剧院里，剧院富丽堂皇而又不失质朴与庄严。我们坐在舒适的位子上，尊贵的客人即将来临。我们被告知：从现在起门将上锁，谁也不许离开；当他出现时，请呆在座位上别动，不要鼓掌。因而我才不必花费很大的力气得以表达我对于民主的偏爱，不至于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之中，因为，这位客人——现在正大步跨过舞台，向放在中间的椅子走去——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国皇太子殿下；而我们，则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正在日本国立剧场举行第十三届年会，会议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其时是1991年的8月。

皇太子殿下安然就座，像我们大家一样。在他的左后方，立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宫廷官员，他面对我们，嘴角低垂。皇太子一直面含微笑。舞台上的这两位形成鲜明的反差，就象同时上演悲剧和喜剧。他讲着很好的英文，非常娴熟。讲稿显然大部分出自他自己之手，因为他谈到当

他有一次目睹镰仓时期一条古道遗迹时他对于道路与交通问题的兴趣是如何被激发了起来——而这正是日后他在日本以及去英国研习的科目。他还告诉我们，在游历欧洲后，他对日本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他讲话和结尾，他以一种我所遇见过的最富挑战性，最值得称道的方式将他的研究领域与我们的领域——交通与比较文学——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用一句高村光太郎的诗结束了他的演讲：“地上本来没有路，我走过以后才有路。”

他的讲话启发我去思考一个问题：自然行迹(course)与人文话语(discourse)之间，本文与对本文的阅读之间的关系。旅行同时也是对旅行者的自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心灵历程。旅行所留下来的痕迹本身就是分裂而散乱的，并不像在高速公路上那样各种车辆总是互相尾随，仅仅具有同向、相向或背向这几种简单关系。旅行所产生的话语同样分裂而散乱。如果说写作总是一种灵魂的历险，那么对于未知地域的旅行更是如此。阅读亦然。阅读是一种与未知本文的接触，它同样具有历险的性质，具有人类学的特征。阅读留下的痕迹既是一种自然行迹，又是一种人文话语；既有正确的读解又会有误读；因此如果想成功地描绘出其轮廓与轨迹，我们最好必须意识到其歧变性与模糊性。

因为阅读或诠释实际上是在写作另一个本文。阅读一个本文而不同时写出另一个本文是不可能的。我们开始我们的旅程，期待着与那不可预测的未知领域的相遇。在此过程中，我们成为一位进行自我质询，自我追问的人

类学家，就像一位永不疲倦、满腹狐疑的诠释者精神分析学家一样，我们必须同时期待着能发现潜藏在自己头脑中的前提观念，如果我们想揭示出隐藏在研究材料之中那些不可见或者无声的观念并因而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话。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去追寻另一个旅程。我得承认，在日本逗留期间，我同样沉醉于某些非常伤感的幻想之中，想象着那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皇太子，为外交礼仪所束缚，在身著制服的宫廷近侍的护卫之下，幽闭于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宫墙之内，会不会梦想着发现某种秘密通道以引导他逃离那深宫高墙，并且或许帮他找到一位妻子（现在他果真找到了一位妻子）。我想这是我对他这个本文进行解读的一个极好例子。像许多感伤故事一样，我的这个故事看来也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我想追寻的这另一个旅程经常被人提及，这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很大方便。对这个旅程的记载生动而且富于启发意义，但正如最近的一位评论者 B·W·伊夫(B. W. Ife)所论，其本文的复杂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①。由于这次旅行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认真阅读其记载，把它视为话语本文而不是直接的描述，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在此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关于本文相遇(Textual encounter)，本文化了的旅行，以及作为旅行的本文——对那未知的他者，那建构于文化之上的不可捉摸的自我进行探索的心灵旅程。

我指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旅

行。哥伦布的航行充满喜剧色彩，耐人寻味而又令人毛骨悚然。彼得·休姆(Peter Hulme)在《殖民相遇》(*Colonia Encounters*)一书中对这次旅行的某些部分进行了描述。此书的观点是我要讨论的话题之一，我会部分地引用此书的有关材料。^②

在返航即将到达亚速尔群岛时，哥伦布的船队受到一场特大风暴的袭击。哥伦布担心搜集到的宝贵资料会丢失，于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抄在羊皮纸上，放入一木桶中，封好，扔下了船。此后就无影无踪。但哥伦布却成功地经受了这次袭击并且留下了一份日志。日志的历史相当复杂。1493年春首航归来后他把日志送给了伊莎贝拉王后。1504年王后去世，日志也随之消失。不过王后生前曾叫人抄了一份并且把抄写本送给了哥伦布。接着这个抄写本也不见了，据测可能是为了支付他孙子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而卖掉了。因此我们现有的不是日志原文，而是拉·卡萨(Las Casas)所写的《西印度群岛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其中有四十章节录、转写或者直接引用了日志原文。伊夫怀疑拉·卡萨的资料也是从原作复制品的摘录中摘录出来的。因为拉·卡萨的节录有大约80%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而只有20%是第一人称；而且，拉·卡萨书中的叙述者满腹猜疑，缺乏同情心，就像一位令人讨厌的编辑。因此，甚至在着手分析这次旅程之前，我们就能感觉到其本文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许只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才可与之媲美。

就是在四次航行之后，哥伦布也从未意识到他发现的

并不是真正的东印度群岛。他估算出加那利群岛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为 2400 海里。哥伦布是位严格的航海家，当船队正好航行了 2400 海里之后他就登陆了，带着两位船长以及两个皇室官员，以确保在声称对该岛的所有权时一切都符合法律程序。交易是这样的：为了换取终身总督的职位，哥伦布得将 90% 的收入交给皇室。同时他还肩负着使忽必烈汗皈依基督教以及组成一个反伊斯兰联盟的使命。

鉴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哥伦布的日志与其说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还不如说记录的是他所“没有”见到，他想见但没有见到因而必需说服自己说是见到了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所见的只是先在地存在于语言中的东西。本文“似乎”看到的東西与它实际上“显示”出来的东西是两回事。这一点非常有趣而且颇为耐人寻味。因此，在阅读日志本文时，必须意识到本文中潜在的无意识。凡是本文描述显示出困惑、犹豫的地方或无声之处，也就是最具有启发意义之处。

日志湮没无闻。轰动全欧的伟大地理新发现的消息是由一封大约十二页长的信传出来的，这封信叙述了发现新大陆的过程。这份公开的文献，航海的官方记载，是写给国王和王后的，力图说服他们：

陛下将会看到我会给您尽可能多的金子，如果陛下愿意给我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的话。^③

可以看出,这封信对事情作了最为乐观的设想,描述很少,而许诺则很多。信包括相互对立的两大部分:被18世纪称为“高贵的野蛮人”的话语以及“怪物”的话语。只有两种可能性:叙述者要么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要么从经验的层次上说是准确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我们倒要去寻找证据,以证明哥伦布的确看到了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了。

在第一部分话语中,一切都那么奇妙无比。土著人羞怯而聪明。他们慷慨热情,赤身裸体,美丽而宁静。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一切都如此安详和乐,根本上没有什么怪异的东西。没有黑人。他们的独木舟行走如飞。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大量的,数不清的金子”,“许多香料”。他们认为哥伦布是从天上下来的。而哥伦布却以为“瓜那”或古巴就是日本或中国(震旦)本土。与当地人的双边经贸联系建立了起来,而哥伦布当时却认为自己是与忽必烈汗的人做生意。

但还有第二部分的话语。对于另一岛屿“瓜里斯”(Quaris)而言,事情完全两样。此岛上的居民被描述为“凶悍,吃人肉”。他们“四处抢劫并且往往洗劫一空”。更为可怕的是,航海者们还面临着种种其他的危险和威胁:

有些岛上的人与马提尼诺岛上的女人通奸,这是从西班牙到印度途经的第一个岛屿,岛上没一个男人。这些女人不干女人们该干的事,而是舞枪弄棒……她们用铜蝶武装和保护自己,她们有数不清的这

种蝶子。

在另一个岛上：

他们力图使我相信他们的岛比西班牙岛（在海地）更大，他们都相信，这个岛上的人都不长头发。岛上有数不清的金子。^①

而“加勃”（Carib）岛上的居民则被简单地称之为“妖怪”。休姆曾考证“cannibal”（食人者）一词是怎样由 carib 引申而来，在《暴风雨》一剧中莎氏比亚正是在此词的基础上创造出妖怪“Caliban”这个形象。哥伦布笔下“食人者”的形象实际上是从地中海古老的神话传说中派生出来的。看来你所见到东西的实际上是你所阅读的东西，观察者所具有的先在知识结构决定着观察的内容。

但是如果哥伦布果真如此接近忽必烈汗的话，他必须作出解释，他为何从未遇见过他。到达古巴或者“震旦”的海岸后不久，这位天才的航海家决定改变航行的方向。他并没有继续向西和西北方向行驶，到“Quinsay”或杭州去寻找马可·波罗所描述过的神奇财富，而是掉过头来返航了。那封官方信件是这样来解释返航的原因的：

在枯燥乏味，毫无变化的长期航行之后，我发现海岸线正向北方伸展开去，而这正是我想要避免的。冬季已经来临，我想往南方去，再加上风正助我南行，

于是我决定不必坐等气候变化，决定返航了。^⑤

他的确永远也没到达杭州。这似乎是天气的错。但他的日志是怎样解释返航这一现象的呢？日志说得不多，但却隐含着大量的信息。

日志的记载就其想得到预想中的财富的那份急切劲而言近乎怪诞。但日志中同样充满着无法言喻的焦虑，虽然这一点也许更为隐而难见。日志不停地叙说着金子，但这些金子却只能在土著人的身体上才可以见到。下面是对于与土著人首次遭遇的有关描述。注意叙述视点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其特征之一：

接着他们见到一些赤身裸体的人，船长乘一全副武装的船只上岸去……许多岛民围了上来……我急切地四处寻视，试图发现是否有金子。我看到有人身上带着一小块，从鼻子上穿的一个洞中垂下来……通过打手势，我得到这样的信息：在南方……有一位国王，有大量的金子，全部装在大坛子里面。（1492年10月15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土著人就不断把哥伦布指引向别处，指向别处的什么东西（哥伦布无疑把它当作是金子），指向那老是在山的那边或地平线远处的什么地方。日志接下来记载说，哥伦布一直“看见”赤身裸体的土著人的“腿上，胳膊上，耳朵上，鼻子上以及脖子周围到处都是

金镯子”(10月15日)。

七天以后,也就是与土著人首次接触的一个星期之后,1492年10月22日的日志记载了他明显的不耐烦感和挫折感:“昨天整个晚上以及今天我一直在等待着,想看看这片土地的国王或是其他什么人会不会给我带来金子或是别的有价值的什么东西。”

印第安人老是指向金子,可望而不可及。他们说:“古巴纳坎”(Cubanacan)。根据拉·卡萨的解释,意思是“在古巴的中央”。而哥伦布则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说的肯定是“忽必烈汗”。越来越近了,他想。于是,他满心喜悦、满怀希望地写道:

……晚上,在隐约的烛光中,人们在海滩上捡着金子,然后用锤子将它打成金条。(11月12日)

他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觊觎着忽必烈汗的大堆金子。这些金子如此撩人魂魄,然而却只在印第安人的身体的饰物上才可以到见,而这些金子实际上可能就在西班牙人的眼皮底下(这些可怜的西班牙人),在夜幕中,摇曳的烛光之下,被秘密地挖掘出来。他相信,印第安人用手势告诉他,在西南方向有大量的金子,珍珠和香料。但同时也有长着一只眼的人以及长着狗鼻子的人:

他们茹毛……饮血,割敌人的生殖器。于是船长决定回到船上去。(11月4日)

哥伦布还听到了许多关于野人的报告,日志写道,但他却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他想这些印第安人可能正与忽必烈汗的人作战,并且有的被俘了,于是当他们不再生还时,就被认为被野人吃掉了。他派出一个小分队翻过山峰去寻找大汗。但没有成功。

于是他改变了航向,彻底告别了“日本”、“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不可言喻的富裕城市,向东以及东南方向返航了。先前日志本文语言中充斥着矛盾,所激起的涟漪和波澜,那些关于食人者、妖怪、女武士的故事以及那种明白无误的对于阉割的恐惧,现在则变得越来越确定,越来越自信了。可以看出,日志的潜意识是怎样为日后这些领土的被殖民和奴役作好了本文上的准备的。

以前: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船长说,毫无邪恶可言,没有丝毫侵略性。(11月12日)

现在:

他们一千个也抵不上我们三个,所以他们适合于接受命令,替别人工作,以及干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还有盖房子,学会穿衣服,接受我们的风俗习惯。

(12月16日)

我们唯一要做的学习他们的语言,给他们发布命令,因为无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照

做不误(12月21日)。

那些抵制“基督徒”(在日志中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西班牙人)的人,则被简单地视为魔鬼,当作顽冥不化的野人。

日志本文的另一个无声之处是关于印第安女人以及对于误置的阉割恐惧的解释。哥伦布提到一个女孩,她来到了船上。日志记载说她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可以想见,水手们对其他女孩是没有好好保护的。第二次航海日志中有一个段落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一段是由船长的一个意大利副手古尼奥(Cuneo)记下来的:

当我在船上时,我弄到了一个漂亮的加勒岛女孩,是船长大人给我的。当我将她带到我的船舱里时,她一丝不挂——这是他们的风俗。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想拿她取乐的欲望,于是我试图去满足我的这种欲望。她不愿意,用指甲拼命地掐我,我直悔不该那么待她。但是——还是长话短说吧——我于是拿起一根绳子,使劲地抽她,而她则发出如此可怕的尖叫,你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我终于得出结论,我敢肯定她是在一个专门训练娼妓的学校里长大的。^⑤

到1493年的1月中旬,日志怀疑到处都是野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什么记载。这些吃人肉的野人实际上